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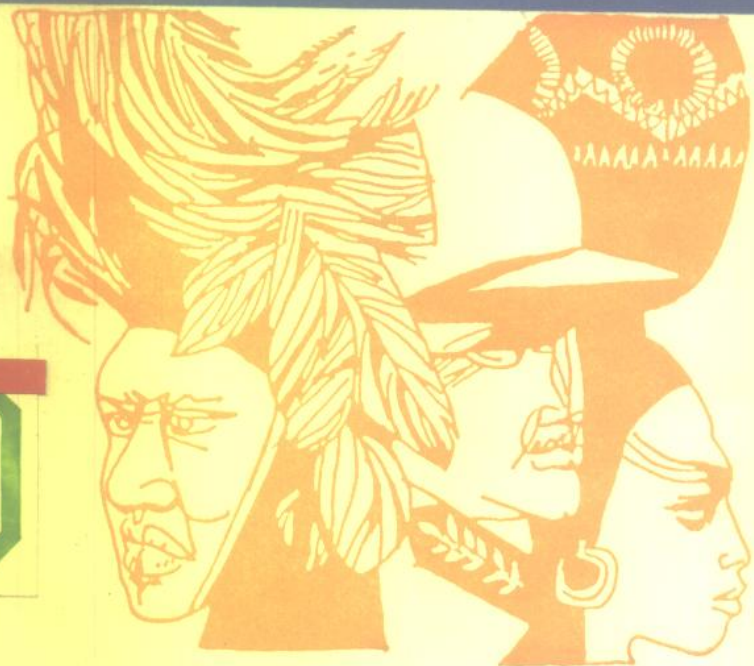
# 从传统人 到现代人

— 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

(美) 阿列克斯·英克斯 著

戴 维·H·史密斯

顾 昕译





\*0582380\*



2 020 1009 1

#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

——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 著  
戴维·H·史密斯

顾昕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156号

*Alex Inkeles and David H.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4

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译出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

——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 著  
戴维·H·史密斯

顾昕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 1000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6.375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436 000 册数：1-3 500

ISBN 7-300-01259-7

C·82 定价：8.80元

## 鸣 谢

虽然我们二人做了绝大多数为本书奠定了基础的分析工作，但是，如果不添加霍华德·舒曼(Howard Schuman)和爱德华·瑞安(Edward Ryan)的名字，就无法准确地说明该计划做为一个整体的发端和实现。他们同作者一起发展了这一冒险事业的基本理论取向，并且把基本的思想转译成实际的研究方案和详细的问卷。舒曼博士在东巴基斯坦\*建立并指导实地调查的机构从事访谈工作；瑞安博士在尼日利亚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他们二人都负责管理对由各自国家的实地调查小组收集的資料进行编码。令我们非常遗憾的是，当我们仍处在数据分析的早期阶段时，他们有了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涯。虽然如此，随着后来的发展，他们的影响仍不断地渗透到该项计划之中。

我们还要深深感谢国家实地调查小组的其他指导者，在本项计划开展后，他们加入了研究行列，尽管如此他们仍及时地为本项计划的构想、设计和实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指导者包括：在智利，是朱安·塞萨·加西亚(Juan Cesar Garcia)，卡洛塔·里奥斯(Carlotta Rios)和安娜·玛利亚·宾多(Anna Maria Pinto)是其能干的助手；在以色列，是乌齐·皮利德(Uzi Peled)；在阿根廷，是皮里亚·吉巴扎

---

\* 今孟加拉，下文凡指国名时均改为“孟加拉”。——译者注

(Peria Gibaja)；在印度，是阿玛·K·辛格 (Amar K. Singh)。此外，奥拉土恩德·奥洛科 (Olatunde Oloko) 在尼日利亚是一名助理指导者，而阿玛杜拉·米亚 (Amadnl-lah Mia) 和奴里·伊斯拉姆在孟加拉是舒曼博士的特别助手。没有这些人表现的献身精神，没有他们在面对无休止的其他事务和障碍时所表现出来的决心，没有他们在种种情况下所发挥的智慧和理解力，这项计划不可能指望取得现在的成功，哪怕是微小的成功。

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到，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具有天资的年轻研究者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有赖于当地学术领袖所给予的合作与支持，例如智利的彼得·海恩茨 (Peter Heintz)、阿根廷的吉诺·杰玛尼 (Gino Germani)、孟加拉的胡塞恩 (A.F.A.Husain) 以及尼日利亚的戴克 (K.O.Dike)。这些杰出的学者还直率地给予我们忠告和批评，我们高兴地表达我们对其慷慨支持的钦佩。

鉴于我们研究的范围和规模，如果没有众多研究助手的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既不可能处理大量数据，也不可能从中提炼出完整的含意。哈里特·华塞斯特拉姆 (Harriet Wasserstrum) 在早期承担重要职责，她显示了充沛的精力，令人兴奋的敏捷，惊人的记忆力和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在发展OM-500 (本书中最常利用的一个量表) 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其他人之中，艾里卡·弗克斯 (Erika Fox) 作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服务工作。1971年初，当研究计划转移到斯坦福大学实施时，莱里·梅耶 (Larry Meyer) 成为我们的主要助手。虽然受雇为计算机程序员 (在这方面他显示了无以伦比的技能)，但他的作用很快超出了这个角色的限度。他的透彻的评论和深思熟虑的批评，对我们手稿的各个部分都产生了影响。在许多老资格的作者和负责草拟最后文稿的人看来，梅耶更多地已成为一位合作者而不是

助手。

我们的专职研究助手来自相当大数量的兼职研究生。他们的工作使我们得到了许多必不可少的帮助，新颖的想法伴随着年轻人的活力得到了激发。其中三位研究生在该计划的资料中找到了写博士论文的基础：冈瑟·博洛什克(Gunther Boroschck)讨论了阿根廷和智利的政治态度与价值，罗万·爱尔兰(Rowan Ireland)论述了工厂现代性的后果，约翰·威廉姆森讨论了对生育控制的态度。此外，在我们同研究生的合作中，合作时间最长、最多产的两位是里夫·万尼曼(Reeve Vanneman)和马丁·怀特(Martin Whyte)，他们就许多主题写了出色的记录。博尼克·艾里克森(Bonnic Erikson)是当地的统计学顾问，她明智的忠告和严厉的告诫所产生的效果，特别在关于现代性量表的构建和内容的章节中得到证明。我们也从苏姆鲁·艾克索伊(Sumru Aksoy)关于城市生活的著作、彼得·伊万斯(Peter Evans)关于职业类型的著作、吉尔达·马拉关于乡村生活的著作、罗恩·台泼曼(Lorne Tepperman)关于工作经验的著作以及米隆·朱克曼(Miron Zuckerman)关于生活满足的著作中获益良多。戴维·伊格斯菲尔德(David Eaglesfield)、戴维·洛佩兹(David Lopez)、雷切尔·杰维茨(Rachel Javetz)、菲莉斯·卡曾(Phyllis Kazen)、霍华德·拉姆泽尔(Howard Ramseur)、南希·西尔弗曼(Nancy Silverman)、艾伦·西蒙斯(Allen Simons)、理查德·舒兹曼(Richard Suzman)和南希·威廉姆森(Nancy Williamson)也做出了贡献。此外，我们得到几位学生的帮助，这种帮助大大超出了学生的工作范围，特别是安娜·玛丽亚·宾多(Anna Maria Pinto)，她分析了关于家庭的数据，以及麦塔·斯宾塞(Metta Spencer)，他从事了许多主题的研究工作。

如此庞大的计划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集体的事业，各种小组相互合作，其中管理人员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极其幸运的是，有三位能力超常的人负责此事。从计划一开始到实地调查结束，沙利·西格尔(Sharlee Segal)对我们的财政和管理事务给予了坚定的、充分的、有力的控制。自计划于1971年转到斯坦福之后，玛莎·普夫(Martha Puff)在管理上显示了同等价值的素质。然而，在该计划执行的更长一部分时间内，是由伊莉莎白·杜恩(Elizabeth Dunn)主持我们的日常事务。她应付着庞大的预算、堆积如山的文稿、大群学生助手、大量敏感的计算机程序员和具有高效率的老资格分析员。她的贡献对于本项目计划是不可缺少的，指导者向她致以特别的、个人的谢忱。

这项基于在六个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长期访谈的研究，发放了上万份“开放式”问卷，这就带来了难以应付的数据处理工作。这些数据非常准确地被转移到IBM卡和计算机软盘上，这要归功于布赖恩·辛克莱尔(Brian Sinclair)，他后来在利用我们的特殊程序进行回归分析上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马塔·菲什(Marta Fisch)在随后的一学期也成为我们的计算机程序员。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更早的一段时间协助辛格博士在印度收集资料。莱恩·乔伊纳(Lynn Joiner)和索尼娅·卡洛里(Sonia Cairoli)在这一过程中也做了一些零散的工作。

以某种经过适当转换但又有意义的方式把所有被记录下来的事实从计算机中提取出来的工作，由一批批有效率的、富于想象力的程序员来完成。除了那些已经提及的以外，我们还应该提到马里骄·米勒·沃尔什(Marijo Miller Walsh)，他在我们分析数据的第一阶段做了大多数尝试性的、大量的操作工作；还应该提到能干的温迪·杰克逊(Wendy Jackson)，他肩负起我们中期工作的负担。伯特·鲍德温(Burt Baldwin)负

责冗长而复杂的一系列回归分析，彼得·勒米厄 (Peter Lemienx) 用计算机为对照组设计了基本的程序。我们的两名研究生助手，加里·韦尔奇 (Gary Welch) 和约翰·达菲 (John Duffy) 也对漫长的数据处理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随着我们写作的进展，玛丽娜·芬克尔斯坦 (Marina Finklestein) 提供的温和的提醒和贤明的忠告使全书获益甚多，她是国际事务中心的前任编辑。对于必须随时无休止地修改的手稿的打字和校对工作，我们要感谢伊莉莎白·伯克 (Elizabeth Burke)、艾里卡·福克斯 (Erika Fox)、科利·佩特森 (Corey Patterson) 以及玛莎·帕夫 (Mortha Puff)。阿姆农·伊格拉 (Amnon Zgra) 帮助绘制了表格，迪安·尼尔森 (Dean Nielson) 写了一些脚注、两人都还协助做了其他一些事情。伊莉莎白·邓恩 (Elizabeth Dunn)、艾森斯塔特 (S.N. Eisenstadt)、邦尼·艾里克森 (Bonnie Erickson)、约瑟夫·卡尔 (Joseph Kahl)、拉里·梅耶 (Larry Meyer) 和霍华德·舒曼承担了对定稿前一份草稿的批评性阅读工作，他们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评论并提出了大量极好的建议。我们承认我们只接受了有限的几条建议，因此现有的一切缺点应由我们负责。在编辑、校对以及在成书过程中核对手稿的最后阶段，我们从凯伦·米勒 (Karen Miller) 和理查德·舒兹曼 (Richard Suzman) 的帮助中获益匪浅。

我们刚才一直在列数要感激的个人，因为从事研究的是人，而不是机构。然而若非我们有幸能找到有勇气为我们确定的计划这类高风险投资项目担保的机构赞助者，就不可能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国务院文化事务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以及斯宾塞基金会的慷慨资助。此外，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波士顿学院提供了相当数



量的计算机机时。

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设立了一个机构，以各种方式创造适宜学术研究的气氛，同许多同事合作，使得深入中肯的批评和独自超脱的努力很好地结合起来。然而，在这个协会中，关键的人物是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中心主任。他对于我们工作的多年持续的兴趣和毫不犹豫的支持，对我们能够进行研究并取得成功的结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当作者和研究计划总部转移到斯坦福大学时，我们从教育学院院长亚瑟·科莱达西（Arthur Coladarci）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支持。

在这个研究领域，没有我们的主人国家<sup>\*</sup>有关机构的慷慨合作，我们是不可能安排这项计划的。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社区，安排了可以接受的访问点，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帮助确定当地的访谈人员，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让它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的研究计划服务。我们特别要感谢达卡大学社会福利学院、在阿巴丹大学的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研究院、在智利圣地亚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迪塔拉研究院、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以及印度的兰奇大学心理学系。由于篇幅有限，还有许多其他的机构我们无法提及，但我们不会忘记它们。因此，我们借这个机会，以非个人的名义，向那些以如此广泛的方式帮助我们的组织和人民，致以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我们还要感谢允许我们从作者以前发表的研究中利用材料并随后在本书中采用这些材料的所有人和机构。它们包括：

1. 美国社会学联合会（华盛顿特区），它是戴维·H. 史密斯和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的“OM量表：关于个人现代性的比较

---

\* 主人国家：Host countries，即被研究的国家。在这里，作者把研究者当作被研究国家的客人，是尊重被研究国家的表现。——译者注

社会心理学测量”一文（载《社会测量》第4期，1966年12月）的出版者。

2.伊什瓦兰（K.Ishwaran）和布里尔（E.J.Brill），他们分别是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个人调适的命运”和“学校做为现代化的背景”两文（分别载《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1970年6月第2期和1974年第3、4合期）的编辑和出版者。

3.德塞（A.R.Desai）以及印度孟买的撒克尔有限公司（Thacker & Co., Ltd.），他们分别是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的“在关于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中的实地调查问题”一文（载《未发达社会的现代化论文集》第2卷，1971年）的编辑和出版者。

4.南希·哈蒙德（Nancy Hammond）以及在密执安东兰辛（East Lansing）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署，他（它）们分别是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的模式：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一文（载《社会科学与新社会：跨文化研究和理论构建中的问题》，1973年）的编辑和出版者。

5.科尔·S·布雷姆贝克（Cole S.Brembeck）和蒂摩斯·J·汤普森（Timothy J.Thompson）以及马萨诸塞州莱兴顿的海斯公司（D.C.Heath and Co.），分别是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的“职业经历的作用”一文（载《教育发展的新战略》，1973）的编辑和出版者。

# 目 录

<b>第一部分</b>	<b>基本原理</b> .....	1
第 一 章	引言 .....	3
第 二 章	现代人的一个定义 .....	19
第 三 章	研究设计与样本结构 .....	47
第 四 章	实地调查工作的进行 .....	67
<b>第二部分</b>	<b>测量个人现代性</b> .....	98
第 五 章	两个案例研究 .....	99
第 六 章	编制综合现代性量表：现代性的综合测量 .....	113
第 七 章	综合现代性量表的内容：根据经验证据重新 检验个人现代性概念 .....	143
第 八 章	个人现代性的社会相关因素 .....	179
<b>第三部分</b>	<b>现代化的背景与原因</b> .....	196
第 九 章	学校做为现代化的背景 .....	197
第 十 章	现代性与大众传播媒介 .....	215
第 十 一 章	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 .....	229
第 十 二 章	工厂现代性 .....	262
第 十 三 章	农业合作社的作用 .....	287
第 十 四 章	城市非工业工人 .....	309

第十五章	城市经历的量与质	319
第十六章	农村出身与城市出身	339
第十七章	家庭与学校背景	347
<b>第四部分</b>	<b>总结与结论</b>	<b>366</b>
第十八章	个人现代性的行为表现	367
第十九章	总看法：解释变量的相对影响和总影响	388
第二十章	个人现代化的过程	407
第二十一章	总结和结论：论个人现代化的社会重要性	423
附录A	问卷	460
附录B	OM-12量表：短表	496
附录C	A组变量	501
附录D	迁移与个人现代性	503
附录E	配对控制表	506
译者后记		509

第 一 部 分  
基 本 原 理



## 第一章 引言

每个时代都面临着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的戏剧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经常占据着世界舞台中心的是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斗争，通常是首先摆脱殖民统治而取得解放，然后发展并进入现代世界。60年代是“发展的十年”。然后，多数新出现的国家虽有所发展但十分缓慢，有些甚至倒退。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普遍的政治不稳定以及特殊的种族、宗教和人种的冲突。

然而，对此还有更多的解释。经验强调某些观察家已经指出的问题：外交承认和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并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生。许多新的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缺少使得国家成为有活力、有效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业的制度结构的空壳。经济和技术上对殖民势力的依赖由地方性的活动所取代，政府制度不得被改造或重新建立，学校体系不得不修补或扩充，所有这些，再加上无数工作，必须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来完成。因此这些国家在建设上一直没有更蔚为壮观的进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认识到除非人民的态度和能力同其他形式的发展步调一致，否则国家建设和制度的建立只是徒劳无益的行动，这需要时间。显然，从近来大多数历史时期来看，这种接合（articulation）不单纯是，或者说不主要是民族独立的一个函数。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继续生活在较早的时代，这个国家要迈进20世纪是不可能的。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参与的公民，需要对

公共事务有积极兴趣并且做为社区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利、尽自己的义务的男男女女，这种社区的范围比亲族网络和当时的地理区域更大。现代制度所需要的个人，要能够遵守既定的计划，遵从抽象的规则，基于客观证据做判断，服从不是由传统或宗教而是由技术才能所合法化的权威。构成现代社会系统之基础的工业秩序中复杂的生产工作，也有其要求。工人们必须既可以接受精细的劳动分工，又必须使其活动同许多其他工作人员的活动相协调。基于技术才能和客观的成就标准的报酬、符合机器生产需要的严格的权威等级结构以及产品与生产者的分离，所有这些都是这种新环境的一部分，它要求那些要把握其需要的人具有特殊的个人品质。

此外，现代政治和经济制度同样对在其中工作的人们提出了某些一般的要求。他们必须要能更多地接受在职业和工作地点方面的个人流动性；他们要能欣然适应工作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这要求他们具有成为一名创新者的倾向；他们要更多地容忍非人格性的东西、无偏见性和差异，这些在复杂的组织中代表着背景不同的受雇者的特征。任何类型的制度都不会对宿命论或消极更加宽容，而是赞扬不断的努力和自信的乐观主义。

扎根于传统的农业乡村社会、禁锢在近乎封建的土地占有形态、受制于死命保持其权力的自私精英、依赖于不合时宜以及不适当的公共组织、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利益绝缘以及不受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刺激的人们，并没有轻易表现出这些以及相关的素质。然而，随着民族解放与发展的斗争，个人解放的斗争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

被强有力的、经过扩展的家族体系的盲目义务束缚的某些男女，已经在寻求维护他们做为个人的权利。某些人试图在选择住所、职业、政治从属关系、宗教派别、婚姻、朋友和敌人方面赢得更多的自由。他们试图以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少的宿



命安排的更开放的体系来代替封闭的世界，他们在这个封闭世界中的生活圈子是最狭窄的。某些人已经从墨守成规转变到准备接受变化。由于以自身的差异性代替了对陌生人和敌人的恐惧，某些人更加确信并容忍人类的多样性。他们已从僵化和固步自封转向灵活和认知上的开放。他们现在寻求打破消极性和宿命论、以及使自己屈从一种一成不变的、不可思议的更高命令的从属关系，以变得更积极、更有效，对个人生活和集体命运负起更大的责任。

然而，这一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而且不幸的是这一过程通常只影响少数人。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足够多的人口，其中肯定有一些人自发地发展了这种现代化的素质，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某些种族和宗教的群体似乎更有可能产生这种类型的个人。瑞士的清教徒、东欧的犹太人、印度的拜火教徒以及尼日利亚的伊波族（Ibo）似乎都适合这一点。然而，大多数男女必须更多地在个人的基础上来获得他们的现代性。对我们来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成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

这样，我们就从这样一种信念开始，即人并不是生来就是现代性的，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使之现代化。我们认为我们应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并且开始着手检验我们的理论。要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搞清楚我们所谓的现代人（Modern Man）指的是什么。我们的现代人概念，部分派生于行为的方式，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是因为在工厂工作而形成的，我们把工厂看成是近代文明的制度模式的缩影；这一概念的另一部分派生于我们对许多角色（例如学生、公民、听众、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家庭成员）的承担者所必须具备的一般素质的评价，这些角色对于一个庞大的当代城市-工业社会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在